

论屈原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李慧芳

(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5)

摘要: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原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原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屈原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原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关键词:屈原;楚辞;屈原;汉赋;韵文;骚体赋;《楚辞章句》;齐言句式;杂言句式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3-0111-05

关于楚辞与汉赋的源流关系,目前相关研究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将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作为重要参考。而细察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在于骚体赋也体现在非骚体赋,即使在骚体赋范围内,楚辞影响的体现也不尽相同。从句式上讲,受到楚辞影响的汉赋包括三类:一是《楚辞章句》所录汉代骚体赋;二是《楚辞章句》未录汉代骚体赋;三是骚体句式和散体句式交替出现的赋,文中称为骚散相间体赋。文章就以此三类作品为介,对屈原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做一探讨。

一、《楚辞章句》所录骚体赋: 对屈原齐言句式的过度依赖

屈原楚辞主要以六七言句为主,亦有从三四言到七八言等参差不齐的形式。从意群上看,多以数个偶句构成一章,章内数句之间字数或互不相等,或完全等同,形成既整齐又错落有致的形式特点。相对来说,字数不等的杂言句式在屈原楚辞中居于主要地位,而结构相同或字数完全等同的齐言句式比重略轻,但也有一定数量^①。略举几篇为例。

《离骚》开篇即言:“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1](3)}三句均为上七下六句式;又有:“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晻

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轶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1](43-46)}一连九句,亦均为上七下六句式。同样的句式组合另有数处。屈原的其它作品中也有类似句式或较为规范的齐言句式,如《大招》全篇绝大部分为四言;《九歌·国殇》通篇七言;《天问》多为四言;《招魂》里的四言句式等。屈原楚辞中的齐言句式对汉赋亦有影响,就《楚辞章句》所录汉代骚体赋而言,影响尤其深刻。

《楚辞章句》所录汉代骚体赋中,较早的作品还是以杂言句式为主、齐言句式为辅的。如《惜誓》共38句,上七下六句式仅两处,每处4句,共8句;《哀时命》共80句,上七下六句式共五处,依次为7句、6句、4句、4句、12句计33句。两篇作品里的齐言句式所占比重都不大,但自东方朔《七谏》开始就出现了转变的迹象。《七谏》之中,《初放》《怨世》《怨思》《谬谏》仍以杂言句式为主;余下的有《自悲》《沉江》《哀命》三篇,其中《自悲》共34句,从第12句以下几乎全为上七下六的句式;《沉江》共40句,有35句也均为上七下六的句式;《哀命》共20句,有18句为上七下六句式。可见在《七谏》创作之时,汉代骚体赋中的杂言句式比重已有所减弱。在《自悲》

《沉江》《哀命》的上七下六句式,上句的七言中包含“兮”字,如果将虚词“兮”字忽略,那么这些句式就都成为六言齐言句式了。《七谏》之后,王褒有《九怀》,其中《匡机》共11句,有8句均为五言齐言(包含“兮”字);《通路》18句,有16句均为五言齐言;《昭路》16句,有8句均为六言齐言;《尊嘉》共15句,有14句为五言齐言;《畜英》11句,有10句为五言齐言;《株昭》17句,有15句为上五下四句式;余下的《危俊》《思忠》《陶壅》篇,以及王逸《九思》的《疾世》《遭厄》《悼乱》《伤时》《守志》篇,通篇均为六言句式。《楚辞章句》所录汉代骚体赋中齐言句式的逐渐增多,使这些作品的面貌更加整齐,也体现出作品对屈原楚辞中整齐句法的继承。

从屈骚中的齐言句式下观《楚辞章句》所录汉代骚体赋,即可知道在西汉前中期的一段时间里,虽然骚体赋主要继承的是屈原楚辞以杂言句式为主的典型骚体形式,但同时对其中的齐言句式多有吸收,而且齐言句式有逐步增加的趋势。《章句》所收的汉代七家37篇骚体赋,除《招隐士》外,其余的多被指缺少情感注入,导致作品失去感染读者的力量。而从各篇作者人生际遇来讲,除了《九怀》作者王褒、《九思》作者《王逸》外,其余五家均曾有过不愉快的人生经历,如《惜誓》作者贾谊的先受宠后遭放,《七谏》作者东方朔的屈居倡优之境,《哀时命》作者庄忌的身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对抗夹缝,《九叹》作者刘向的多次遭贬下狱等。尽管汉代文士在威权统治下负荷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需注意到他们思想中仍保留了浓厚的黄老成分。汉初盛行的黄老思想无法平衡政府集团与豪强集团、劳动阶层之间的矛盾,也无法满足中央集权统治模式的需要,自身也缺乏完善的文化建设体系^[2],因此在汉武帝登基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原本显要的政治地位;但黄老思想中的道家成分还保留在汉人的思想深层,并在适当的时机反映出来,体现为作品中政治失意的落寞之叹。除了思想局限外,充满局促感的外在形式也是个重要原因。有限的篇幅和整齐的句式,将试图从屈骚里继承下来的瑰丽的想象、奔放的激情限制在固定的框架里,并最终使激情堕落为局促于作品体式里的文字符号,而失去了感染人心的巨大魅力。

二、《楚辞章句》未收骚体赋: 屈骚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的 此消彼长

与《楚辞章句》所录骚体赋相比,其他骚体赋的

体式相对灵活得多。但在汉赋发展进程中,这部分骚体赋中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也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运动状态。

西汉初贾谊有《吊屈原赋》,其“乱辞”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②风飘飘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③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④偃蟠蛰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⑤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驎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⑥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⑦凤凰翔於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⑧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於蝼蚁。”^⑨^{[3](218)}这段乱辞的句式基本上两句一转,活泼有致。贾谊另有《鵬鸟赋》,该赋全文以上五下四的句式为主,中间杂以六七言句,虽然句式转换的频率比《吊屈原赋》稍低,但整体上仍具变化感。

到了武帝时司马相如所作的《哀秦二世赋》,这种变化感得到了更大限度的发挥:“登陂陀之长阪兮,坐入曾宫之嵯峨。○○^①临曲江之隈州兮,望南山之参差。○○^②岩岩深山之谿谿兮,通谷豁兮谿谿。汨渫吸习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③观众树之蓊蓊兮,览竹林之榛榛。○○^④东驰土山兮北揭石瀨。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⑤呜呼哀哉!○○^⑥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亡归而不食。○○^⑦复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休。精罔闾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⑧呜呼哀哉!”^⑨^{[3](243-244)}此赋共14句,句式依次为:七言(1句)、上七下六(1句)、上八下六(2句)、上七下六(1句)、九言(4句)、四言(1句)、六言七言六言(1句)、上七下六(2句),最后以“呜呼哀哉”一句四言句结束。短短十数句,句式转换多达八次,产生了跌宕错落的美学效果。这之后一段时间,骚体赋中的句式呈现出极强的变化性。而齐言句式的运用除了通篇为上七下六句式的汉武帝《李夫人赋》外,总体上较为沉寂。

至成帝时,扬雄作有《太玄赋》,其中有这样一段:“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极。奚贪婪於富贵兮,迄丧躬而危族。○○^①丰盈祸所栖兮,名誉怨所集。○○^②薰以芳而致烧兮,膏含肥而见燹。○○^③翠羽嫩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圣作典以济时兮,驱蒸民而入甲。张仁义以为纲兮,怀忠贞以矫俗。指尊选以诱世兮,疾身歿而名灭。○○^④岂若师由聃兮,执玄静於中谷。”^⑤^{[3](408)}句式依次为:上七下六(2句)、六言(1句)、七言(1句)、上七下六(4句)、六言(1句)。句式转换的频率有所降低,各句之间的字数差距也不如《哀秦二世赋》那样

大。班婕妤《自悼赋》和刘歆《遂初赋》中也重新出现了较大篇幅的齐言句式。

及至东汉，骚体赋句式更趋整齐。东汉初冯衍《显志赋》开始出现较长规模的齐言句式，全篇 130 句，其中 124 句都是上七下六的句式；东汉中叶张衡《思玄赋》中除了“观壁垒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凌惊雷之硃礚兮，弄狂电之淫裔”^{[3](761)}一段外，其余多为上七下六的整齐句式。《思玄赋》的句式构成，说明骚体赋发展至东汉，已经处于齐言句式为主、杂言句式为辅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崔篆《慰志赋》、班固《幽通赋》中得到继续。到汉末应玚《愍骥赋》之后，就变得更加整齐了。王粲《出妇赋》《寡妇赋》《登楼赋》《迷迭赋》，陈琳《大荒赋》，繁钦《砚颂》均是如此。

综上，杂言句式和齐言句式在汉代《楚辞章句》之外的骚体赋发展进程中的相互比例，是经历了一个如表 1 所示的此消彼长的发展轨迹的。

表 1 《楚辞章句》外汉代骚体赋之杂言、齐言句式发展情况对比

句式	汉初	西汉中	两汉之际	东汉初	东汉末
杂言句式	并行	大盛	存在	再盛	存在
齐言句式	并行	存在	盛	存在	大盛

作为骚体重要标志的杂言句式在骚体赋中一直存在，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高峰、衰退、再高峰、衰退的阶段性历史发展过程。而在屈骚中就已经存在但不引人注意的齐言句式，在两汉骚体赋发展进程中与杂言句式同生共存，此消彼长，最终在汉末达到全胜。

综合汉代骚体赋全貌来看，骚体赋呈现出了由散趋整的态势。这种态势从汉赋发展的角度说，与汉大赋的繁盛及衰弱密不可分；从广义的汉诗层面说，与两汉诗歌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汉代五言诗萌生，汉高祖戚夫人《春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春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4](91)}除了开头两句，余下皆是五言。武帝时李延年为女弟作《歌》曰：“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4](102)}除最后一句外其余都是五言。成帝时班婕妤所作《怨诗》则通篇皆是五言。进入东汉，五言诗逐步兴盛而成熟，《古诗十九首》被誉为汉代五言诗的代表作。此外，七言诗也得到发展。梁启超先生认为“自战国到西汉，七言作品绵延不绝”。^[5]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等人制作的

《郊祀歌》十九章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中均含有较多的七言句，其中《景星》前半部分是四言，后半部分全是七言。汉代六言诗也有发展。两汉五、六、七言诗的萌生发展及成熟，使诗歌体式逐渐趋向整齐；处于汉诗发展的大环境中，屈骚句式在骚体赋中的流变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呈现出趋整态势。

三、骚散相间体赋：骚体句式与散体句式的兼容并蓄

除了骚体赋外，汉赋中还有一种骚体句式和散体句式交替出现的赋，也体现出其对屈骚体式的借鉴。这种体式的赋只有少数是全篇，余下很大一部分都是残篇，有些大概能看出原貌，有些则比较困难。篇目包括贾谊《策赋》、王褒《洞箫赋》、刘向《雅琴赋》、刘歆《甘泉宫赋》、扬雄《蜀都赋》《河东赋》、班彪《冀州赋》、傅毅《舞赋》、李尤《德阳殿赋》《辟雍赋》、张衡《温泉赋》《南都赋》《羽猎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梦赋》、马融《长笛赋》、朱穆《郁金赋》、侯瑾《箴赋》、蔡邕《霖雨赋》《汉津赋》《瞽师赋》《箴赋》《笔赋》、边让《章华台赋》、应玚《愁霖赋》《灵河赋》《撰征赋》、祢衡《鹦鹉赋》、王粲《大暑赋》《游海赋》《浮淮赋》《初征赋》《羽猎赋》《神女赋》《玛瑙勒赋》《思友赋》、阮瑀《纪征赋》《止欲赋》、徐干《序征赋》、陈琳《大暑赋》《止欲赋》《神女赋》《迷迭赋》《玛瑙勒赋》《车渠碗赋》《悼龟赋》、繁钦《愁思赋》《述行赋》等，计近 50 篇。

以张衡《温泉赋》和蔡邕《汉津赋》为例，可见出骚体句与散体句的共存状态^①：“阳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远行，顾望有怀。遂适骊山，观温泉，浴神井，风中峦，壮厥类之独美，思在化之所原，美洪泽之普施，乃为赋云：○○览中域之珍怪兮，无斯水之神灵。控汤谷于瀛洲兮，濯日月乎中营。○○荫高山之北延，处幽屏以闲清。于是殊方跋涉，骏奔来臻。○○士女睟其鳞萃兮，纷杂遝其如烟。”（张衡《温泉赋》）^{[3](759)}“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汉兮，披厚土而载形。发源自乎蟠冢兮，引漾沔而束征。纳汤谷之所吐兮，兼汉沔之殊名。总畎浍之群液兮，演西土之阴精。○○过万山以左回兮，旋襄阳而南荣。切大别之东山兮，与江湖乎通灵。○○嘉清源之体势，澹澹浚以安流。○○鳞甲育其万类兮，蛟螭集以嬉游。明珠胎于灵蚌兮，夜光潜乎玄洲。维神宝其充盈兮，岂鱼龟之足收。○○于是游目骋观，南援三洲，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

迁有无。既乃风森萧瑟，勃焉并兴。阳侯沛以奔骛，洪涛涌以沸腾。愿乘流以上下，穷沧浪乎三溟。覩朝宗之形兆，瞰洞庭之交会。”(蔡邕《汉津赋》)^{[3](852)}这类汉赋中兼具骚体句式和散体句式，句式时整时散，字数忽短又长，使作品观之错落有致，诵之跌宕动听。

有学者将这类赋称作“骚散相兼体赋”，认为是“骚体赋和散体赋两种体式互动互补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体式。……多出现于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其基本构成方式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散体铺排描写兼以骚体抒情式。这种类型的赋作，从整体布局上看很像散体赋，但赋中骚体句和散体句的比例又大致相当。……另一种是骚散相兼以铺排描写式。”^{[6](73)}另有学者将这类赋称作“骚赋”：“作为一种新的文体，汉赋汲取了‘楚辞’许多形式方面的特点，而当它在汉赋之世‘蔚成大国’以后，又反过来给‘楚辞’体以相当大的影响，并逐步与‘骚’融合而形成一种更新的文体。……因此我们说，这是一种在形式上兼类‘骚’与‘赋’，而实质上又不同于‘骚’与‘赋’的新文体。许多学者将《楚辞章句》以外的‘楚辞’体作品称为‘骚赋’，似乎有些不妥，若将这个称谓给予《洞箫赋》《甘泉赋》一类作品，就名副其实了。”^[7]“骚赋”的名称在赋史早已有之，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赋史大要》将赋史分为六期：第一为骚赋时代，自周末屈原宋玉前后，至汉文帝景帝之间；第二为辞赋(古赋)时代，自汉武帝自魏晋之交期间；第三为俳赋(骈赋)时代，自晋宋至唐初之间；第四为律赋时代，自唐及宋初之间；第五为文赋时代，宋代属之；第六假称八股文赋时代，清代属之^[8]。陶秋英先生《汉赋研究》称屈宋赋为骚赋^[9]，姜书阁先生《汉赋通义》分汉赋为丽则骚赋时期(自陆贾至淮南王安群臣)丽淫大赋时期(司马相如至刘歆)、抒情小赋时期(冯衍至王粲)^[10]。游国恩先生《楚辞概论》中称司马相如之前的赋为“骚赋”也有这种意思^[11]。赋史意义上的“骚赋”概念与此处的“骚赋”定义相比，虽说定义标准不同，仍然有重名之虞。鉴于这类赋中骚体句式和散体句式交替出现的情况，笔者个人认为称之“骚散相间体赋”更合适些。

关于骚散相间体赋的成因，也有不同的解说，有从抒情功能角度加以申说，认为是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受到散文式思维方式影响所致：“汉代骚体赋首先继承了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的抒发，……但与汉代的散体赋一样，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散文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骚体赋又表现出与散文中说理散文、描

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这也是汉代骚体赋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趋势。这种趋势促进了汉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表现功能的互渗与互补，使汉代骚散相间体赋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6](62)}也有从文体发展角度进行探索的，《论楚辞句式对文体赋的侵淫》一文引《七发》中的骚体句式作为文体发展例证：“《七发》毕竟是早期的赋作，楚骚句式在文体赋中的运用并不成熟，更没有定型，因而篇中这惟一的一段骚体句，在运用和表现上显得相当拙稚：从形式上看，句式对偶不工，而且有非对偶的奇句；从功能上看，纯为描写性的叙述，却未能发挥骚体句应有的抒情作用；从来源上看，‘祝兮忽兮’之类的句式源于《老子》等先秦韵文，而非楚辞的嫡传。这种不成熟，正反映了楚辞句式最初在文体赋中得到运用的实际情况。”^[12]不论是从抒情功能还是从文体发展角度解说，两者都认为这类形式的赋是骚体句式与散体(文体)句式的糅合。

骚散相间体赋不始于汉代。1972年出土的《唐勒赋》和宋玉诸多作品中韵散结合的句式证明了骚体和散体共用的句式在楚国已经出现。从骚散相间体赋的形态可以看出，这类赋的骚散相间状态并非是汉代骚体赋和汉大赋的简单碰撞所致，而是以先秦散体与先秦骚体，或许还有其它文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源头。兼之屈原本身就接受了先秦散文的影响，因此这类赋所接受的先秦散文体式的影响是多重的。从文体流变的角度说，这类赋源自屈原楚辞骚体和先秦散文散体或其它文体，是它们在汉代传承的融合体；从文体互渗的角度说，它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再度受到汉代骚体赋和散体大赋的双重冲击，是两者在同一时代范围内的融合体。

综上所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体现于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两类作品，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收部分与其它骚体赋也有不同。屈原楚辞骚体句式中的齐言句式为《章句》所录作品因袭，以致于这些作品在体式上显得拘谨；而在其它骚体赋中，屈骚句式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此消彼长，最终齐言句式居上；而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体式在汉代的传承和相互影响，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发展和成熟。很多骚体作家既创作骚体赋又创作骚散相间体赋，如贾谊有《吊屈原》《鵬鸟赋》《策赋》，刘歆有《遂初赋》和《甘泉宫赋》，班彪作《北征赋》和《冀州赋》，扬雄有《反离骚》《太玄赋》和《甘泉赋》，张衡有《思立赋》和《温泉赋》，蔡邕有《述行赋》和《汉津赋》

等，证明了骚体句式和散体句式在汉代 400 年间同生共存的状态。

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多形式流变，可以启发我们以新的角度去观察汉赋的发展历史及规律。一方面，知道屈骚句式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骚体赋而且体现在非骚体赋中，有助于将楚辞汉赋的源流关系拓展到更宽的研究层面；另一方面，明了屈骚句式对汉赋的影响贯穿两汉始终，启发我们对目前多以骚体赋、大赋、抒情小赋作为汉赋发展三阶段的描述认真思考，以动态的眼光重新审视汉赋发展的轨迹。

注释：

- ① 一章之内数句构成方式相同，但一句之内上下句字数不等的句式，接近齐言句式，文中将这类句式列入齐言句式范围。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等。
- ② 不同句式之间以○○相隔，下同。
- ③ 骚体句式与散体句式之间以○○相隔，下同。

参考文献：

- [1]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 朱义明. 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J]. 中南大学学报, 2009, (6): 793-794.
- [3]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4]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 梁启超.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6: 105.
- [6] 孙晶. 汉代骚体赋文体功能的发展演变, 中国楚辞学第九辑[C].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 [7] 郭建勋. 略论“楚辞体”作品在汉代的流变[J]. 中国韵文学刊, 1990, (1): 78.
- [8] 铃木虎雄. 赋史大要[M]. 台北: 正中书局, 1947: 11.
- [9] 陶秋英. 汉赋研究[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38-40.
- [10] 姜书阁. 汉赋通义[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9: 74-272.
- [11] 游国恩. 楚辞概论[M]. 北京: 北新书局, 1926: 301.
- [12] 郭建勋. 论楚辞句式对文体赋的侵袭[J]. 中国韵文学刊, 2000, (2): 1-2.

Qu Sao sentence's rheology in Han Fu

LI Huifang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Hangzhou 310015,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academic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 Ci and Han Fu has mainly focused on sao type fu of Han Dynasty, with its inheritance of ChuCi as a key. Actually, ChuCi's impact on Han Fu is not only limited in the sao type fu. From the view of formal characteristics, we can find that Qu Sao sentence in Han Fu is mainly reflected in sao type fu and fu with sentences of sao style and prose style. In terms of sao fu, the sentences in and outside "Chu Ci Zhang Ju" are also different. Those sentences in "Zhang Ju" overly depended on the tidy-character sentence in Qu Sao, others inherited the tidy-character sentence and the unequal-character sentence, and the latter gradually increased; Han Fu's compatible of Qu Sao sentence and prose sentence before Qin contributed the prosperous of fu with sao type and prose type.

Key Words: Qu Yuan; Chu Ci; Qu Sao; Han Fu; Verse; sao type fu; Chu Ci Zhang Ju; tidy-character sentence; unequal-character sentence

[编辑：汪晓]